

精准扶贫模式的人类学思考

——基于对人畜混居治理困境的调查

裴圣愚¹,杰福瑞·柯恩²

(1.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俄亥俄州立大学 人类学系,美国 哥伦布 43210)

摘要:精准扶贫自实施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工作模式在民族地区的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人畜混居治理困境的出现,说明精准扶贫工作所需要应对的突出问题是如何保障少数民族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和如何发挥本土知识对发展起到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引入人类学的理论和视角,建立一种统筹本土知识、国家整合与“他者”关怀的扶贫模式,将有利于生成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更好地提升扶贫成效。

关键词:人畜混居;本土知识;精准扶贫;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X(2018)05-0145-05

一、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 40 年间,党和国家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使 7000 万人口脱离了贫困,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进而将“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作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途径,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以及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精准扶贫等重大项目的实施使中国取得了减贫扶贫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展现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步实现的可能性。有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收入转移计划和以非食品为基础的社会安全最终使贫困人口在自己的经济决策中有了更多的选择。^[1]又例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DPI)在 2016 年达到 7413 元,同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成就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还不能完全满足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要求。改

革开放以来,借助市场经济建设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经济的集中增长和比较优势^[3],而西部地区仍面临着贫困问题的巨大挑战。截至 2016 年,民族 8 省区(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青海)共有农村贫困人口 1411 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总人口的 32.5%;贫困发生率 9.4%。^[4]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也发现,贫困人口需求的多样性与致贫原因的复杂性给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增加了许多困难。^[5]这说明,面向西部和针对少数民族的精准扶贫工作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此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视角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思考,从而建立一种更加精准的扶贫模式,提升工作水平。

二、人畜混居治理的困境

G 县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县,经济发展滞后,交通条件较差,居民收入较低,面临着贫困问题的严峻挑战。2015 年,G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4519 元,地方财政收入 0.68 亿元。^[6]Q 村是 G 县北部的一个以怒族、傈僳族、藏族为主的行政村,辖 10 个村民小组。2017 年,有人口 1246 人,385 户,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0 多元。该村位于山腰台地,海拔 1500 米左右,用地非常紧张,人均耕地不到 2 亩。

收稿日期:2018-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循证的城市社区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CMZ029);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作者简介:裴圣愚(1983-),男,湖北襄阳人,副教授,博士,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问题、民族理论;杰福瑞·柯恩(1962-),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Jeffrey H. Cohe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Q村的怒族村民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同时养殖猪、鸡、牛等家畜。怒族民居主要采用木质井干式和干栏式结构,以堂屋和火塘作为其鲜明的建筑特点。^[7]这种构造的房屋适应了当地的地势落差,所形成的空间被怒族人用作养殖棚,圈养家畜。根据调查,Q村怒族的牲畜养殖圈棚的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上卧下畜,即上方为家中的卧室,下方养殖牲畜,衣被等也直接晾晒在圈棚正上方,卫生状况较差。在所走访的农户中,近三分之一是此种混居形式。二是上厨下畜,即上方为家中的厨房,下方养殖牲畜,这种形式最便于将日常饮食中的废弃物投入圈中喂食牲畜。在所走访的农户中,三分之一多是此种混居形式。三是上储下畜,即上方为家中的储藏间或杂物间,存有收割的粮食、农具、木材等物品,下方养殖牲畜。在所走访的农户中,三分之一多是此种混居形式。受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上述情况在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山区农村较为常见,有的地方戏称为“一楼畜牧局,二楼人事局,三楼粮食局”。虽然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是社会普遍将这类居住和圈养形式称为“人畜混居”。人畜混居被认为是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具体表现,不利于农村居民健康,并且是区域贫困落后的集中反映,是脱贫攻坚的“拦路虎”。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级政府把“人畜分离”作为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之一,采取了多种举措以期彻底改变和消除“人畜混居”。现有扶贫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一是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专项工作机制,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表现出了很强的治理决心。二是以新建集中养殖的牲畜圈舍为主要治理方式,有的地方仍是分散养殖,但新建砖混结构的独立圈舍,还有的地方通过新建和改造住房的方式告别“柴扉为门、四面漏风、上楼下圈”的原有居住条件。^[8]三是以奖代补对分离户进行扶持和鼓励,有的地方每户补助1000~1500元或每平方米补助200~400元,有的地方补助1吨水泥或其他材料物资。^[9]四是重视宣传教育,通过扶贫工作组、健康卫生专题讲座、张贴画报、召开群众会议的方式积极引导村民思想认识的转变。毫无疑问,人畜混居的专项治理使许多贫困地区的乡村环境和村民居住养殖方式得到极大改善。但在一些地方,分离式牲畜圈舍的使用情况并未达到预期,包括所调查的Q村,部分圈舍在短暂使用之后被弃用,村民依然回到传统的混居方式进行养殖。于是对人畜混居的治理出现了一

种“尴尬”的困境:一方面,外界对当地居民无视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帮扶,依旧进行混居养殖感到不解;另一方面,当地居民对一种习惯和传统忽然间成了马上要被消除掉的“问题”感到困惑。应该说,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贫困群体对于获得项目扶持、提升生活水平、寻求发展机遇的需求是很强烈的。然而,从各地人畜混居治理的效果来看,“分离”似乎并不是当地居民最迫切的需求,现有扶贫模式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混居”。这反映出,当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真正做到“精准”,从而进一步提升贫困治理的成效。

三、人畜混居现象的再认识

人畜混居被视为一个社会焦点问题加以关注源于新闻媒体对四川省凉山州的有关报道。2015年6月,新华社刊发《直面中国贫困角落——来自扶贫攻坚现场的调查报告》,报道了四川、广西、云南、宁夏等民族地区的贫困情况,尤其提到仍然存在着人与牲畜同在一屋的“人畜混居”现象。几乎在同时,一篇出自大凉山小学生的作文《泪》走红网络,被媒体称为“最悲伤作文”,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的热议。尽管有关部门一直将提升居住环境和养殖水平作为扶贫工作的内容之一,但是,极高的关注度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使之在短时间内上升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上级领导和社会公众的重视成为很多地方迅速启动专项治理工作的源动力之一。在此情况下,部分扶贫举措在仓促实施的过程中就极有可能忽视现象背后的传统因素,从而导致了治理困境的出现。

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加深了我们对贫困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那些贫困的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10],也就是说,混居的原因绝对不能简单地用某某民族素质低来片面解释。^[11]根据对G县Q村的田野调查,当地怒族村民以人畜混居方式进行养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受空间狭小、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Q村怒族形成了井干式和干栏式的建筑传统,上层住人,下层养殖牲畜,既利于通风、防潮、防寒、避雨,又适应地质条件而保障了坚固、安全。怒族村民认为这种传统形式的圈棚冬暖夏凉,对牲畜来说非常舒适,新建的分离式圈棚则都是用砖石和水泥砌成的,猪会皮肤痒,养不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住在里面“猪都不自在”。而且,多年来当地没有因混居而发生过人畜间的传染病,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村民们对健康卫生问题的担忧。

其次,与养殖方法相适应。自然环境的特点也决定了牲畜养殖和玉米小麦种植成为Q村最主要的经济生产活动。猪的饲料主要是包谷面和猪草的混合物,先煮成糊状,再用大桶倒入猪圈喂养。一位怒族村民告诉我们,猪一般一天要喂养两次,上午十点左右和下午六点左右,平均一头猪一天要吃大概二十斤。所以,人和牲畜距离越近,搬运饲料越省力,越便于喂食。加之怒族利用牲畜积肥耕种的习惯,混居也便于提取肥料进行农业生产。而且,平时人吃剩下的东西或者其他废物也可以随手扔入猪圈中。因此,混居方式对于每天需要重复进行体力劳动喂养牲畜的村民们来说非常省力、省时。另外,该村的牲畜养殖还处在自给自足的低水平阶段,每户猪、牛、鸡等的数量有限,村民们对牲畜的长势也不太关心,他们说“长多少算多少,够大了就杀掉自己吃”。由于当地没有规模性养殖的需求,现有的混居方式完全满足了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再次,与收入水平相适应。由于Q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村民收入较低,“他们所能做到的,唯有利用当地生态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的自给自足”^[12]。于是成本低、便于就地取材的木头、石头成为修建屋舍的主要材料。据当地民宗局干部介绍,尽管农户需要交一定的费用办理砍伐证,每年的砍伐额度并不大,但实际上各个村都默许村民砍伐附近的林木免费使用。所以村民们都说“水泥要花钱,木头不花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很难愿意主动拿出钱来修建分离式的水泥猪圈,特别是对于深度贫困户来说,原有的混居方式无疑是最为经济实惠的办法。

相对封闭的自然社会环境使传统与习惯得以延续,进而内化为当地怒族有别于其他地区 and 民族的特点,反映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历史传承和文化特征。例如,传统房屋在建盖时需要付出许多劳动,所以选择修建现代的石棉瓦空心砖的房屋会被认为是房主贫困、懒惰的表现。^[13]时至今日,在询问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养殖时,怒族村民们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习惯了”。正是基于上述的适应,Q村村民普遍不认为“人畜混居”是“问题”。当我们询问是否考虑改变混居方式时,他们一脸茫然,沉默许久后回答“没想过”,当追问是否可以接受分离方式时,他们以并不肯定的语气回答“可以吧”。显然,村民们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渴望延续传统,而对外界关注与支持的期待又让他们不得不去迎合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的要求。事实上,经过近年来各级各类项目的实施,

Q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以往已经有了很大改善,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电视信号,农民收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村民们尽管不愿怒族生存的空间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影响而彻底改变,也不愿本民族经济社会文化传统被“现代文明”完全替代,但是他们明白,精准扶贫和一系列的项目将带来更多的外部资源,促进村寨的发展,增加收入。拒绝和否定“人畜分离”将会极大地降低获得后续资源的可能,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所以,建而不用、分而不离就成了最适合的策略,从而导致了现有精准扶贫模式的部分失效,导致了“尴尬”的局面。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四川凉山出现的人畜同屋与G县Q村的上厨下畜、上储下畜反映了不同程度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人畜同在一屋的极端贫困问题应刻不容缓,通过快速而有效的手段完全消除,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但就Q村而言,混居养殖已经成为本土知识系统中的一部分,在“三个相适应”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不宜通过强制性措施推行人畜完全分离的养殖方式。对于这类现象,要根据民族、区域等实际情况加以甄别,不能简单地将“混居”直接同封闭、贫困、落后、无知划等号,要充分认识到传统在地方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制定出符合群众意愿的实施方案,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引导其转变。精准扶贫不能被简化为修路建房,新路新房不会自动带来精准脱贫。短期、单一的方案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等其他因素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无法真正满足当地群众的需求,也无法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这意味着,对于一般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精准”治理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可以通过人类学的视角和理论,利用本土知识来完善精准扶贫的措施,实现对“精准群体”的“精准问题”的“精准治理”,增强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

四、构建人类学参与的精准扶贫模式

研究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扶贫和发展方式是绝对有效的^[14],因而成功的关键是要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方法。许多少数民族社区正处于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过渡的阶段。在这期间,通过外来的帮助可以改善其生活条件,但要将其转化为自我发展则面临很大困难。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区实现扶贫对象、项目、资金、措施、人员、成效的精准为人类学的应用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和巨大的空间。事实上,对“他者”(少数民族)的关怀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主要的学科传统。不仅是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深描等方

法,还包括参与发展在内的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中,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实践中。^[15]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将增强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减少政策成本,能够为消减贫困地区贫困、推动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智力支持。^[16]所以,人类学要走进田野,更要在田野中“有为”。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由于高度重视文化和区域特点,人类学可以成为不同文化和知识系统之间的桥梁。成为本土知识和国家整合之间的“润滑剂”,消除两者之间在贫困治理中的对立矛盾,使少数民族参与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使传统知识成为扶贫规划和执行中重要而有益的元素,促进生成“精准”的政策措施,大大提高扶贫脱贫的效力和效率,更好地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更好地提升扶贫工作成效,更好地促进学科发展。

由于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定义了普遍的发展模式,地方传统被认为是不可理喻和低级的。^[17]学术界也曾围绕着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理论展开过热烈的讨论。^[18]受此影响,时至今日,精准扶贫工作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依然是忽视了少数民族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忽视了本土知识对发展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其实,最好的经济应是文化适应的经济,世界经济“工具箱”和地方文化“工具箱”都不是可以简单肯定或否定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挑拣外来的经济工具成分,以及本土文化工具成分,并加以整合,新传统才可以在挑拣过程中树立起来。^[19]本土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具体地方的现实状况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使扶贫工作者更好地与当地民众进行沟通交流。随着对地方文化习俗的熟知,双方能够形成一种包括尊重在内的和睦与融洽,而这种相互尊重既巩固了大家的伙伴关系,又鼓励了地方参与,以共同寻求最佳的扶贫发展方案。特别是在西部民族地区,更好地“聆听”少数民族群众的声音将使扶贫工作产生可持续的良好效应。只有这样,精准扶贫工作的规划、调整、实施等各个方面才能更加“精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时所指出的,要着力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以人类学的理论和视角探讨贫困问题,合理利用民族地区的本土知识,构建人类学参与的精准扶贫模式,提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在实现国家层面发展目标的同时满足地方层面的需求,这是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重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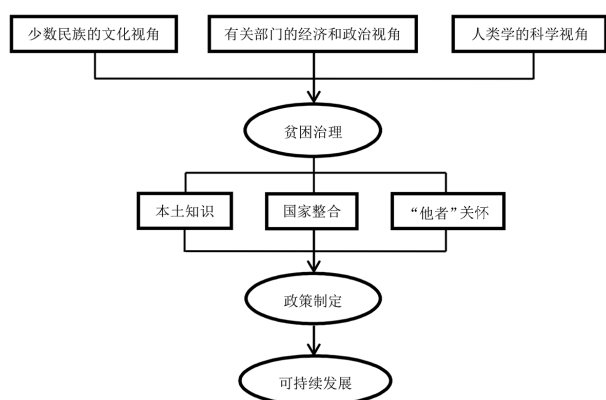


图1 人类学参与的精准扶贫模式

五、人畜混居精准治理的建议

第一,转变“问题式”的治理思路。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来源于对民族和地区文化的了解和误解,因而本土知识对于提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效显得尤为重要。人畜混居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实现人畜分离也不足以消除贫困,它受到G县当地和怒族文化信仰、政治权力、社会实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孤立的视角,以往片面强调人畜混居是脏乱差、愚昧无知,是“问题”,简单地认为修好新的分离式圈舍或者新建住房就可以解决问题,从而形成了短期的“为了改变而改变”的治理思路。现在看来是不适宜的,需要转变思路,把“人畜混居”作为一种“现象”加以系统分析、系统治理,确立长期的“为了发展而转变”的治理思路。

第二,建立“合作型”的治理机制。精准扶贫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的主体是贫困人口本身。忽视他们的主体性,仅通过外部力量来强制改变地方传统是无法做好扶贫工作的。正如农村扶贫面临的“内卷化”困境,需要构建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的扶贫政策体系、项目输入与农民回应相结合的项目运作机制、外部支持与内源发展相结合的扶贫干预体系来加以破解。^[20]怒族村民希望实现整合发展、交融发展,希望在决定自己未来的方面发挥必不可少和有价值的作用。因此,精准扶贫工作要充分信任村民们的发展意愿,充分尊重他们的传统权利,在理解怒族本土知识的基础上将其融入到人畜混居治理的规划、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扶贫工作者要与怒族村民建立平等合作、互为补充的关系,在具体工作中要敢于赋权,发挥村民的自主性。

第三,实施“阶段性”的治理方案。Q村旅游资源丰富,自然之美与文化之美相得益彰,把基于地方传统的特色旅游业作为该村的支柱产业加以建设具有广阔的前景,同时把实现人畜分离与发展村寨旅

游业和养殖业结合起来。旅游业的发展,可以推动该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服务能力的增强、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反之,群众增收、服务提升、设施完善又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样的良性循环过程能促使该村民们认识到,人畜混居不利于旅游环境的建设,人畜分离有利于增加旅游收益。在此基础上,将上储下畜作为主要的过渡形式对上卧下畜、上厨下畜情况进行改造,改“人畜(禽)混居、畜禽混养”方式为“人畜禽分开、单畜(禽)种养殖”方式。通过软硬件条件的改善,逐步改分散饲养为适度规模养殖,推动有条件的试点牲畜养殖的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发挥示范户的带动作用,使村民们主动通过人畜分离后的集中饲养、联户饲养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运用本土知识,深入挖掘各民族优秀伦理道德思想,结合新媒体技术手段,通过大众化的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发扬新风尚,提升区域和民族文化知名度,增强区域居民的自豪感,打造本地区的良好形象。在产业得以形成、收入得以增加、认识得以转变之后,再实现完全分离。

总之,在精准扶贫、精准减贫和促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把国家意志输入地方的同时使地方意愿能被纳入到国家中,不能以所谓“现代化”的价值判断代替“他者”的价值判断,不能以城市的发展需求代替农村的发展需求。因此,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利用和分享本土知识,把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消除贫困方案中的一部分,是一条更为有效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 [1] Ramanujam, N. and Chow, S. Towards a Human Dignity Based Approach to Food Security: Lessons from China and India [J].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2016(2).
- [2] King, N. China Footprin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B/OL]. https://news.cgtn.com/news/3267444f33557a6333566d54/share_p.html, 2018-02-15.
- [3] Li, YR.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inequality in human development [J]. *Regional Science Policy & Practice*, 2012(3).
- [4] 张丽君, 吴本健, 王飞, 马博.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7) [R].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 [5] Li, YH, Su, BZ, and Liu, YS. Realiz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6(3).
- [6]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

统计司.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 2016 [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 [7] 王芳, 刘加平. 怒江中游新地域民居建设策略——以怒族、傈僳族民居为例 [J]. *华中建筑*, 2012(2); 陆邵明, 朱佳维, 杜力. 基于形态语言的地域民居建筑差异性分析——以云南怒江流域怒族传统民居为例 [J]. *建筑学报*, 2016(S1).
- [8] 怒江州民族宗委. 怒江州贡山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建设成效显著 [EB/OL]. http://www.ynethnic.gov.cn/gzdt/dfdt/201805/t20180508_58312.html, 2018-06-05.
- [9] 倪琴, 王陶. 3602 户贫困户告别“人畜混居”时代 [N]. *红河日报*, 2018-04-13(1).
- [10] Frerer K. and Vu C. M.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Poverty [J].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2007(16).
- [11] 吴光于, 吴晓颖, 陈地, 刘海, 刘坤. 揭开传闻与“标签”, 走进真实的凉山 [N]. *新华每日电讯*, 2018-02-09(13).
- [12] 温士贤. 市场经济与怒族社会生计转型——以怒江峡谷秋那桶村为例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
- [13] 张跃, 刘娴贤. 论怒族传统民居的文化意义——对贡山县丙中洛乡和福贡县匹河乡怒族村寨的田野考察 [J]. *民族研究*, 2007(3).
- [14] Lavallée, E, Olivier, A, Pasquier-Doumer, L and Robilliard, 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argeting: a review of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 *DIAL (Développement, Institutions et Mondialisation) Working Papers*, 2010(10).
- [15] 周大鸣, 秦红增. 参与发展: 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 [J]. *民族研究*, 2003(5).
- [16] 元光勇. 工商人类学理论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研究——基于民族地区社会扶贫的实证研究 [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 [17] Escobar, A.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8] Gajdoskienė, I. Oscar Lewis' Culture of Poverty: Critiqu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J]. *Sociology. Thought and action*, 2004(1); Lende, D. The Culture of Poverty Debate, The Culture of Poverty Debate Continued, Culture of Poverty: From Analysis to Policy [EB/OL]. *PLOS Blogs*, 2010; 方清云. 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及对策建议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2(4); 王建民. 扶贫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少数民族主体性讨论为核心 [J]. *民族研究*, 2012(3).
- [19] 庄孔韶. 确立新传统的基石 [J]. *开放时代*, 2007(1).
- [20] 方劭. 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内卷化”困境及其治理 [J]. *社会建设*, 2014(2).

责任编辑: 毕 曼